



中国古代本草学与昆仑文化关系考论

◇彭必生 路 旻

摘要：中国古代的药物文化与昆仑文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早期昆仑神话中西王母、不死药等传说激发了汉代及汉前持续了数个世纪的方仙道寻药求仙运动，进而推动了中国传统药物学的基本范式——本草学的形成，同时也塑造了中国古代本草学追求生命健康与生命升华的双重品性，“昆仑”在中国古代的医学实践与宗教实践中始终保持了重要的象征意义。同时，昆仑区域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交通节点，许多药物经此进入中原大地。在后世的本草学中，三类药物通常被赋予了“昆仑”的文化特色，分别为瓜果素材类药物、矿物药物与香料药物，显现出“昆仑”作为方术文化代表与东西文明枢纽的象征意义。

关键词：昆仑文化；本草学；西王母；矿物药；香料药

中图分类号：D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2338 (2024)05-0010-09

昆仑文化是中国本土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融入了中国古代文化的诸多面相。作为融汇中国古代医学、博物学乃至宗教学知识的本草学，就受到昆仑文化的深刻影响，其思想特征、形成过程乃至具体的药物学内涵都与昆仑文化有密切关联。一者昆仑西王母形象与“不死药”深度绑定，为先民药物崇拜思想的集中呈现。中国古代的药物加工技术对于汉代西王母形象的塑造有重要影响，其中映射出昆仑文化浓厚的生命哲学特质。二者本草学的形成与汉代的方仙道运动有重要联系，昆仑文化又是推动汉代方仙道运动的重要思

想动因。在昆仑神话中，昆仑是重要的神仙居所、理想的生命圣境，西王母、不死药等昆仑传说激发了由帝王推波、方士助澜的寻药求仙运动，留下的诸多药物记载构成了中国古代本草学重要的知识基础与文本范式，也塑造了本草学追求祛病强身与生命升华的双重品格。三者在地理上，昆仑高原是丝绸之路南线的重要交通节点，许多异域商品经此输入中国，其中有很多香料、瓜果与矿物类药物常被描述为昆仑所产或被冠以昆仑、西王母之名而被记入本草书，因此在本草中，昆仑同时也成为东西文化汇通的象征。

基金项目：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先秦道家、墨家技术思想比较研究”(2023lzujbkydx025)；贵州省2021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国学单列课题“儒学视域下的宋明本草哲学研究”(21GZGX33)。

作者简介：彭必生，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讲师；路旻，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博士后。

一、汉代西王母信仰中的药物崇拜观

从先秦到秦汉，昆仑西王母都是广受崇奉的神灵形象，其权柄主要与生死相关，有学者将西王母的神格界定为“死生相系的司命之神”^①。《山海经·西山经》称：“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②这是对西王母形象及其所司神职的较早描述。赵宗福先生认为西王母的这一描述或与其以西之方位为号，在五行中主刑杀之气有关，“西王母所处的西方代表着秋天，属于阴性，秋风呼啸而来，草木摇落，百花枯萎，一派残杀之气使人感到寒冬即将来临。所以，西王母以虎齿豹尾的凶相出现，扮演者死神的角色。”^③至少到了汉朝，西王母所司神职已出现了较明显的转变，以掌控长生的神灵形象出现。就逻辑发展而言，西王母的长生权柄可以说是其代行罚神职的自然延伸，即如钟宗宪先生所称“掌生者亦掌死，司祸者亦司命。此与后世所传阎王执掌人之阳寿者相当”^④。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西王母的长生之能却非如后世阎王借由“生死簿”对人的寿数进行直接加减，而是通过炼制“不死药”来实现，这表明汉代西王母信仰具有药物崇拜的深层内涵。

汉代的西王母形象与“不死药”深度绑定，“不死药”成为西王母神灵权柄的直接显现。尽管《山海经》中就有“不死民”“不死树”“不死之药”之类的种种描述，但相关文本都独立于西王母文本，也就是说《山海经》中的西王母形象尚未与“不死药”特异性地关联起来。到了汉代，“不死药

则已成为西王母诸多传说的中心，西王母更多地是以“不死药”的制作者与执掌者身份出现。如《淮南子·冥览训》中广为流传的“嫦娥奔月”故事，“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恒娥窃以奔月”^⑤，嫦娥窃药是故事的核心情节，西王母赐予后羿的“不死药”被嫦娥盗服而获得了长生，说明让人长生的是“不死药”而非西王母，西王母自身所掌者乃是制作“不死药”的能力。可见在汉代的西王母形象中，西王母的权柄与“不死药”紧密关联而又非同一，汉代的西王母信仰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以“不死药”崇拜为中心。因此汉代西王母的图绘往往都刻意凸显了“不死药”的信仰元素，“不死药”的具体制作过程又成了西王母形象刻画的中心，在其中展现出药材采集、加工处理以及药物炼制等古代药物技术的多个侧面。

首先，在汉代西王母图绘中常出现仙草的图像元素，以表现西王母炼制“不死药”所用的药材，反映出了汉代的药物观。图像中的仙草一般呈现为芝形及禾形：如四川大邑西王母画像砖中有蟾蜍手捧灵芝奉献给西王母的画面^⑥；四川合江《西王母图》中有形如华盖的巨大灵芝形象作为西王母的背景^⑦；陕西绥德《墓门横额画像》中则出现了禾形的仙草^⑧。相应的芝形与禾形的仙草形象正是汉代药物崇拜情况的显现。汉代芝类崇拜非常普遍，《神农经》有“六芝之延年”^⑨的说法，汉武帝派遣方士出海求仙，也云“复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药以千数”^⑩，因此灵芝也成了西王母画像中最常见的仙草形象。另外，西王母画像中也常出现禾形仙草，这在传统上被认为是汉代谶纬中另一类常出现的祥瑞形象嘉

① 钟宗宪：《死生相系的司命之神——对于西王母神格的推测》，载《青海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② 栾保群：《山海经详注》，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98页。

③ 赵宗福：《西王母的神格功能》，载《寻根》1999年第5期。

④ 钟宗宪：《死生相系的司命之神——对于西王母神格的推测》，载《青海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⑤ 《淮南鸿烈解》，载《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48册第573页。

⑥ 《大汉气象：中国汉代画像艺术展》，西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2页。

⑦ 晏满玲：《泸州地区汉画资源调查与分析》，载《中国汉画学会第十二届年会论文集》，2010年。

⑧ 张从军主编：《图说山东汉画像石》，山东美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60—63页。载

⑨ 《博物志》，载《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47册第589页。

⑩（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77页。

禾，郝苗则认为汉代西王母神画中的禾形植株乃是《山海经》中描述的若木和不死草，到了汉代之时与嘉禾的形象发生了合流^①。

其次，汉代西王母图绘中，往往有较细致的药材加工过程的描绘，表明汉代西王母信仰中的药物崇拜更多的是处于药物加工技术的视域之下。西王母画像中的“不死药”并非为仙草本身，而是经加工之后的成药。通常在西王母的图绘中，最吸引人的画面是其中各种动物对药材进行加工处理的场景，相应动物形象也表现出西王母相关的信仰元素也同西王母的神职一般发生了朝向药物崇拜的转变。《山海经》称：“西王母梯几而戴胜杖，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②这是西王母信仰中动物元素的最早叙述，其中青鸟的作用是为西王母“取食”，与“不死药”尚无关系。到了汉代，随西王母形象与“不死药”绑定，西王母画像中的动物形象也转变为辅助西王母采药、炼药的形象，同时动物种类也不再仅限于青鸟，还包括了常与药物关联的其它动物形象如蟾蜍、玉兔、九尾狐。山东嘉祥所出的《西王母制车画像》中，出现了青鸟、玉兔、蟾蜍、九尾狐四种动物共同进行药物加工的场景^③：青鸟嘴中衔药，表现出采药的姿态，两只玉兔合作使用药臼捣药，另有一只玉兔使用研钵研磨药材，呈现出较全面的药物加工流程。西王母画像中的动物通常有不同的分工，一般来说，青鸟是药物的采集者，玉兔是药物的主要加工者，蟾蜍、九尾狐则通常辅助玉兔的工作。如滕州西户祠的西王母画像，其中捣药者为两只玉兔；嘉祥南武山祠堂西王母画像，蟾蜍手托药臼，捣药的也是两只玉兔；嘉祥宋山祠堂西王母像，蟾蜍与玉兔共同捣药；枣庄冯卯乡祠堂西王母画像^④，捣药者为

九尾狐与玉兔。可见汉代的西王母画像，不仅较完整地展现了药物从采摘、处理到炼制的各个环节，还表现出药物加工过程中的职能分工，与世俗药铺的药物加工过程几乎无异，可以说汉西王母画像中的动物加工药物的场景是汉代药物加工技术的宗教化呈现。

最后，汉代西王母图绘还表现出“不死药”加工技术的改变，反映出汉代药物崇拜观念的变化。在大部分西王母画像中，描绘的都是植物形态的“不死药”及其简单的加工处理过程。但也有少量西王母画像中的“不死药”种类及制作方式有明显不同，其中显现出炼丹术的诸多特征。如四川泸州合江《西王母图》中^⑤，西王母坐在龙虎座下，身旁是一灵芝形的植物，右边安置了一具三足丹鼎，丹鼎上还有一个类似金乌的鸟的形象。无论是龙、虎、金乌的形象，还是丹鼎都是自汉代兴起的炼丹术的重要元素，此汉画像可能展示的是汉代“不死药”观念的进一步发展。最早的“不死药”一般是植物形态的天然药物，早期方士的长生方术主要为服用天然的或简单炼制的药物以求取长生，这即是后来道教所称的服食术。到了方仙道活动的中后期，从服食丹砂、炼制黄金的方术中发展出与后世道教外丹术相近的药物饵炼方术。西王母画像中炼丹术题材的汉画像就较明显地反映出了汉代药物崇拜观念以及药物加工技术的这一变化。

在世界许多民族中都曾出现过与“不死药”相关的宗教观念或神话^⑥。汉代西王母信仰表现出明显的药物崇拜特征，可以说是普遍的药物崇拜观念在古代中国的具体呈现。对于先民而言，医药是可资对抗死亡的主要载体，也常因此成为长生不死的象征物，故而出现了较普遍的“不死药”

① 郝苗：《汉代西王母神画嘉禾图像研究》，载《荆楚学刊》2023年第2期。

② 栾保群：《山海经详注》，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470页。

③ 《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篇18画像石画像砖》，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10页。

④ 张从军主编：《图说山东汉画像石》，山东美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60-63页。

⑤ 晏满玲：《泸州地区汉画资源调查与分析》，载《中国汉画学会第十二届年会论文集》，2010年，第281页。

⑥ 霍丽丽：《中西医药神话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57-66页、第105-106页。

神话传说。在逻辑上,从治病之药到不死之药是自然而然的思维延伸,所谓“既是无病,死亦无门,人既不死,即是长生”^①,古人很容易产生这样一种朴素的药物观念:凡药可以愈疾,人能无灾无病,便可尽其天年;如若存在超凡之药,能补充人的生命,延长人的寿数,那么人就能达成长生不死。因此,早期的医药学与宗教学通常有天然的交集。《汉书·艺文志》将药物学与方剂学归于“经方”一目,与“医经”“房中”“神仙”并列,总归于“方技”之中,称“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②,可见汉代医药学与神仙学紧密关联。西王母崇拜正是中国古代医药崇拜的典型代表与集中呈现,在其中也映射出了昆仑文化的浓厚生命哲学特质。通过西王母、不死药等昆仑神话的广泛流布,激发了以“不死药”求取为主题的汉代方仙道运动,推动了本草学这一中国古代特有的药物学形式的形成,同时也塑造了本草学祛病、延年并存的基本目标与药物文化。

二、昆仑神话与本草学的形成

“本草”之术语从汉代开始出现^③。近年来国内外学者普遍关注本草学的形成与汉代方仙道运动的关系,尚志均^④、王家葵^⑤、盖建民^⑥、麦谷邦夫^⑦等学者在相关问题上都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对于本草学这种特殊的药物学形式而言,秦汉间的方仙道运动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影响因素。早期的方仙道运动以环渤海地域为中心,故而

在论及本草学的产生时,话题往往聚焦在环渤海地域的方仙道运动以及作为其文化背景的蓬莱神话之上。但作为中国古代神话体系的另一主干,昆仑神话对方仙道运动也有重要影响,进而推动了本草学的产生并在其中留下了深刻的文化痕迹。

大约从春秋时期开始,就以环渤海地域的燕国、齐国为中心,出现了将海外仙山、仙人、仙药作为叙事主题的蓬莱神话,相关传说也催生了以寻找仙人、求取仙药为务的方士群体。《汉书·郊祀志》有云:“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羨门高、最后皆燕人,为方仙道,行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骑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⑧诚如夏曾佑先生所言“富贵之极,他无可希,惟望不死以长享此乐,此皆人心所动于不得不然”^⑨。方士的神仙妄语与帝王们的长生野心结合,形成了绵延数百年的方仙道运动,从战国时代的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到汉代的汉武帝,冀望不死的帝王们在方士的鼓动之下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海求药热潮。“海上燕齐之间,莫不搯腕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⑩大约成书于魏晋的志怪小说以汉武帝拜见西王母为主题,描写了西王母摆下宴席宴请汉武帝并款待以仙果、仙药^⑪,便是后世对汉代方仙道运动的理想化情景描摹,也凸显出昆仑文化对汉代方仙道运动的影响。

汉代的方仙道运动催生出富含神仙思想的药物学形式,也即本草。“本草”之术语最早见于《汉

①《混元八景真经》,《道藏》载,文物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98年版,第11册第442页。

②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80页。

③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第一册),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岳麓书社2017年版,第109页。

④尚志均:《〈神农本草经〉与古代方士存在历史渊源关系》,载《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⑤王家葵、张瑞贤:《〈神农本草经〉研究》,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63页。

⑥盖建民:《道教医学》,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第39页。

⑦[日]大形徹:《本草と方士の関係について》,人文学论集,大阪府立大学人文学会,1990年。

⑧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03-1204页。

⑨夏曾佑:《中国古代史》,载《夏曾佑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962页。

⑩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64页。

⑪《汉武帝内传》,载《道藏》,第5册第47页。

书》。《汉书·郊社志》有云：“是岁衡谭复条奏长安……八神延年之属及孝宣参山蓬山之众，四时、蚩尤、劳谷、五床、仙人、玉女、径路、黄帝、天神、原水之属皆罢。侯神、方士、使者、副使、本草待诏，七十余人皆归家。”^①又《汉书·平帝纪》有载：“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②《汉书》中提及的“本草”与“侯神”“使者”“副使”等方仙道的方士群体并列，可以判断文中的“本草”之义也应类似，专指某一类方士。故唐代颜师古注《汉书》有云：“本草待诏，谓以方药本草而待诏者。”^③可见“本草”一词的最初含义乃是指精通草木方药之术的一类方士，之后更进一步演变成为具神仙方药特征的药理学体系。本草学早期经典《神农本草经》对本草药物进行了三品分类：《神农四经》曰：“上药令人身安命延，升为天神，遨游上下，使役万灵，体生毛羽，行厨立至。”又曰：“五芝及饵丹砂、玉札、曾青、雄黄、雌黄、云母、太乙禹余粮，各可单服之，皆令人飞行长生。”又曰：“中药养性，下药除病，能令毒虫不加，猛兽不犯，恶气不行，众妖并辟。”^④其中就非常典型地显示出早期本草的神仙方药特征。

本草学的产生与方仙道运动有密切关系，方仙道运动又与昆仑文化紧密关联，主要表现为昆仑神话激发了蓬莱神话的形成，进而对方士的神仙方药文化产生影响。顾颉刚先生曾言：“昆仑神话发源于西部高原地区，它那神奇瑰丽的故事流传到东方以后，又跟苍莽窈冥的大海这一自然条件结合起来，在燕、吴、齐、越沿海地区形成

了蓬莱神话系统。”^⑤昆仑神话作为一种更古老、也更具民间基础的神话体系，对蓬莱神话的形成有重要的激发作用，并在方仙道运动中留下了深刻的文化痕迹。以西王母信仰为例，其对蓬莱神话产生了如下一些影响。

其一，西王母信仰相较于蓬莱神话影响范围更广，与蓬莱神话融合形成了一种完备性更高的神话体系。昆仑西王母题材的汉画像分部非常广泛，西至四川、新疆，南至江苏、安徽，北至陕北，东至山东，都出土过西王母主题的汉画像，显示出西王母崇拜在汉代的广泛流行。与之相比，蓬莱神话则表现出较强的地域性。《汉书·郊祀志》称“元鼎、元封之际，燕齐之间方士瞋目搯腕，言有神仙祭祀致福之数者以万数。”^⑥可见即使在方仙道活动较为活跃之时，方仙道的主要活动区域依然集中在原燕、齐一带。西王母的信仰覆盖了方仙道活动较活跃的区域，在方仙道运动中表现出蓬莱神话与昆仑神话逐渐相融的倾向。如在以长生登仙为主题的马王堆汉墓T形帛画中，下部是大鲛鱼的形象，并有蟾蜍奉上仙药的画面，有学者认为其展示的是“服神药：蓬莱仙岛，海神献药”的主题；画面中部则有仙官奉上仙药和道书的场景，被认为描绘了“登昆仑：受道书，饮玉浆”的过程^⑦。其中可以看出蓬莱神话与昆仑神话的有机结合，并表现出具有逻辑性的体系构建：蓬莱地处海外，凡人更易到达，昆仑则是登天之门径，是比蓬莱更高维、更神圣的神仙居所。

其二，西王母信仰表现为一种以药物崇拜为中心的原初信仰模式，蓬莱神话继承了昆仑神话的很多信仰元素，也表现出药物崇拜的特征。汉

①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58页。

②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59页。

③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58页。

④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96页。

⑤ 顾颉刚：《〈庄子〉和〈楚辞〉中昆仑和蓬莱两个神话系统的融合》，载《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2辑。

⑥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60页。

⑦ 姜生：《马王堆帛画与汉初“道者”的信仰》，载《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2期。

画像中的西王母之形象大致都符合《山海经》中“蓬发戴胜”、青鸟相伴之形象，又“西王母形象的主要表现是凭几踞坐高楼，接受着人们的朝拜。而朝拜之人还要人头蛇身或鸟头、兽头人身怪物引导才行”^①，因此汉画像中的西王母形象具有浓厚的原始色彩。蓬莱神话虽在汉画像中表现不多，在文本上被描绘为“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②，对海外仙境之刻画较昆仑神话更细致完备，呈现出后起神话的特征。同时昆仑神话中的很多元素也为蓬莱神话所继承，包括作为蓬莱神话核心元素的“仙药”观念也与昆仑神话中的“不死药”有密切关联。《山海经·海内西经》中称昆仑生有木禾、珠树、玉树、不死树等物，正是蓬莱神话中仙药的形象来源，即《列子·汤问》所云的蓬莱等神山“珠玕之树皆丛生，华实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圣之种”^③。西王母信仰中的“不死药”崇拜与渤海常出现的“海市蜃楼”现象相结合，就激发了海外仙人、仙药等观念的产生。可以说蓬莱神话中的仙药长生叙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昆仑药物崇拜思想的继承与继续。

其三，西王母崇拜更具民间基础，对非沿海地域的方仙道运动也更有影响力。汉代与蓬莱神话相关的方仙道运动主要局限在帝王与方士的互动中，方士所倡的入海寻仙非惟帝王以国力所资不能成行，因此海外仙山的传说主要流行于近海的燕齐之地，海外仙山之印象也多局限于帝王、士大夫及方士与海边渔户中，还未下沉成为普遍的民间观念。西王母题材的汉画像在汉代墓葬中广泛出现，显示出西王母信仰已成为民间的普遍宗教心态。因此在汉代全国性的方仙道运动中，昆仑文化对于非沿海地

域的方士运动有更直接的驱动力与影响。汉代方士寻求仙药，不仅仅是入海寻求仙药，也有很多内陆方士在五岳死渎寻找仙药，昆仑便是重要的探索目标。在汉代方仙道的相关文本中，展现出许多“昆仑”的线索。如《汉书·郊祀志》称：“世有仙人，服食不终之药，遥兴轻举，登遐倒景，览观县圃，浮游蓬莱，耕耘五德，朝种暮获，与山石无极。”^④《淮南子》曰：“昆仑县圃，维绝，乃通天。”^⑤这里的昆仑即是西王母所在之昆仑。因此在方仙道运动所成的本草书中留下了诸多西王母信仰的痕迹，如本草书对“兜木香”一药的描述中，有“汉武帝西王母降，焚是香也”^⑥之语；又有记录松脂的药物功效时称“服之百日耐寒暑；二百日五脏补益；服之五年，即见西王母”^⑦，可见昆仑文化在本草中的直接留存。

三、本草药物中的“昆仑”与“西王母”

“昆仑”非唯以思想性因素作为文化基因以及形成动因与中国古代本草学发生关联，更是作为药物原产地与输入商路成为本草药物描述经常使用的词汇。本草书中所谓的“出自昆仑”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确为昆仑地域所产，主要以玉及其他部分矿物药为代表；另一种是经昆仑地域输入的药物。劳费尔曾在《中国伊朗编》里罗列输入中土的物产：植物有胡桃、胡麻、安石榴、茉莉、指甲花、水仙、无花果等品种；食物有葡萄酒、豌豆、西瓜、黄瓜、胡萝卜、胡椒、胡蒜、胡葱、糖等品种；香料有没药、安息香、沉香、樟脑、丁香、玫瑰香水等品种；药物有胡桐泪、豆蔻、阿魏、人参、蓖麻子等品种；矿产有硼砂、

① 张从军：《黄河下游的汉画像石艺术》，齐鲁书社2004年版，第127页。

②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04页。

③ 《列子》，张湛注，陈明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30页。

④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60页。

⑤ 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6页。

⑥ 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长编》，商务印书馆1952年版，第1000页。

⑦ 李时珍：《本草纲目》，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年版，第1919页。

硼砂、黄丹等品种；宝石有琥珀、翡翠、绿松石、珊瑚等品种^①。其中很多商品作为药物被记入本草书。可见从中亚流经中国的药物主要分为三类：一是瓜果蔬菜类本草；二是矿物类药物；三是香料类药物。三者都经常被冠以“昆仑”的名号。

首先与“昆仑”常有关联者是以玉为代表的部分矿物类药物，被认为是昆仑道地所产或是作为品质的描述。玉可以说是最能显示本草学神仙方药特征的的药物之一。早在《山海经》中就有关于玉的如下记载：“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崧山……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其源沸沸汤汤，黄帝是食是飧”^②张步天先生考证认为其中的“崧山”地望当在今青海省都兰西北^③，正位于昆仑地域。《神农本草经》称：“玉屑，味甘平，无毒。主除胃中热，喘息烦满，止渴。屑如麻豆服之，久服轻身长年，生蓝田，采无时。”^④《本草图经》对玉的产地作了进一步考证，“今蓝田、南阳曰南不闻有玉，礼器与乘舆服饰多是于阗国玉……采玉之地云玉河，在于阗城外，其源出昆(仑)山。”^⑤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也称：“所谓蓝田，即葱岭出玉之别名，而后也误以为西安之蓝田也。”^⑥其“葱岭”即昆仑山。总之，在中国玉的观念史中，昆仑出玉成为一种文化常识以至有“玉出昆冈”的说法被写入蒙书，这不仅是因玉的出产地，也是因其“久服轻身长年”作为方士文化的代表性药物对本草学产生影响。

在玉之外还有很多炼丹术常用到的矿物类也常被冠以昆仑的名号。比如白矾一药，《本草乘

雅半偈》称“其状如黑泥者为昆仑矾”^⑦；曾青一药，《本草逢原》称“曾空二青，近世绝罕，《千金》云当取昆仑绿代之，即绿青”^⑧；又雌黄一药，唐《新修本草》称“收南林邑者谓昆仑黄，色如金而似云母甲错”^⑨；硫黄一药，《本草纲目》载“今第一出扶南林邑，色如鹅子初出壳者，名昆仑黄……《广州记》云：生昆仑及波斯国西方明之境……并宜烧炼服仙”^⑩。本草书中以上矿物药描述中的“昆仑”普遍包含两方面的含义：其一，炼丹术所用的矿物药中品质佳者被冠以“昆仑”的称号，显示出昆仑文化与早期方士文化的关联；其二，部分海外舶来的药物被描述为“昆仑”所产，表现出“昆仑”沟通中外的枢纽象征意义。

“昆仑”在本草书中作为东西汇通的标志，有两种不同的指向：一者指西域昆仑，主要显示昆仑对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地标作用；二者是由西域昆仑的含义派生而出，并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联的所谓南海昆仑的概念。

本草书的描述中部分瓜果、蔬菜类本草药物常被冠以“西王母”之名，与西域昆仑的含义较为相关。中国很多常见的瓜果蔬菜是张骞通西域后从中亚等地经陆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因此在本草书中，很多瓜果蔬菜类本草都有“昆仑”或“西王母”之名。金代李杲所编《食物本草》中就记载了颇多这样的药物，如其中“冬桃”，称“一名西王母桃，一名仙人桃，即昆仑桃”^⑪；又有“茄，一名落苏，一名昆仑瓜”^⑫，“甘蔗……红蔗亦

① [美] 劳费尔：《中国伊朗编：中国对古代伊朗文明史的贡献 着重于栽培植物及产品之历史》，林筠因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3页。

② 栾保群：《山海经详注》，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83页。

③ 张步天：《从〈山海经〉看青海海东地区古丝绸之路的枢纽地位》，载《青海师专学报》2001年第1期。

④ 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第一册），岳麓书社、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版，第341页。

⑤ 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第一册），岳麓书社、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版，第342页。

⑥ 宋应星：《天工开物》，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293页。

⑦ 李时珍：《本草纲目》，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年版，第669页。

⑧ 张璐：《本草逢原》，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年版，第19页。

⑨ 李时珍：《本草纲目》，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年版，第541页。

⑩ 李时珍：《本草纲目》，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年版，第661页。

⑪ 李杲：《食物本草》，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0年版，第156页。

⑫ 李杲：《食物本草》，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0年版，第139页。

名紫蔗即昆仑蔗”^①等记载。又比如《神农本草经》载“枸杞，一名羊乳，一名却暑，一名仙人杖，一名西王母杖”^②“罗勒，俗呼为西王母菜，食之益人”^③等等。尤其值得指出的，枣作为服食方术中最常见的服食药物之一，广泛地与西王母神话联系起来。在《食物本草》中，有所谓的“仲思枣”，称“北齐时有仙人仲思得此枣种之，因以为名……亦名仙枣，有西王母枣、谷城紫枣皆此类也”^④。《汉武帝内传》专门描写西王母为汉武帝设“玉门之枣”，“七月七日，乃修除宫掖之内，设座殿上，以紫罗荐地，播百和之香，张云锦之帐，然九光之灯，设玉门之枣。”^⑤以上瓜果蔬菜类本草中的“西王母”之名一方面是表现其来自西域与昆仑的关联，另一方面也凸显了昆仑文化对服食方术的重要影响。

香料类药物的记载则同时指向了西域昆仑与南海昆仑。在中国古代的舶来药物中香料类药物是重要代表。据尚志钧先生的统计，李珣《外药本草》所载之外来香药，产于波斯国的有 15 种，产于大秦国的有 5 种，产于西海的有 5 种，产于南海的有 32 种，总计约 57 种之多^⑥。又根据温翠芳《唐代外来香药研究》，在唐代“循着西北的陆线与东南的海线，唐人从南海、印度、波斯与阿拉伯、中亚的康国、地中海周边地区进口了大量香药”^⑦。可见香料类药物主要经陆上与海上两条商路输入中国，其中西北的路线便是经过昆仑

地域的丝绸之路南线。

部分药物中的“昆仑”较明确地对应于西北昆仑地域。如肉豆蔻一药，《海药本草》称“生秦国及昆仑道地”^⑧；苏合香一药，《新修本草》称，“苏合香……今皆从西域来，真者难别，亦不复入药，唯供合好香。谨案此香从西域及昆仑。”^⑨以上所称的昆仑与“秦国”与“西域”并列，可见位置相近，主要象征了中亚经陆路输入的商路，也即“西域昆仑”。另有部分药物则明确指向了“南海昆仑”。如前述硫黄一药，《本草纲目》载“今第一出扶南林邑”，林邑即古占城，在越南中部，其“昆仑”的称呼或是因唐代时相关药物部分经交趾从海上进入中国。又如丁香（鸡舌香）一药，《新修本草》称“出昆仑及交爰以南詹糖”^⑩，同样地处南亚；檀香一药，明代陈嘉谟所编《本草蒙筌》称“产南海昆仑及江淮河朔”^⑪。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木香一药，据《证类本草》，“木香……陶隐居云此即青木香也。永昌不复供，今皆从外国舶来，乃云大秦……《唐本》注云此有二种，当以昆仑来者为佳，出西胡来者不善。”^⑫其中将出自“昆仑”与出自“西胡”的进行了区分，这或是区别了海上与陆上不同的商品进口路线。檀香在《食物本草》中也有相似的描述，“檀香出海南及昆仑盘盘国，虽不生中华，人间遍有之。”^⑬此一记载有《梁书》为证：“盘盘国，宋文帝元嘉，孝武孝建、大明中，并遣使贡献。……中大通元

① 李昊：《食物本草》，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89 页。

② 李时珍：《本草纲目》，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111 页。

③ 李时珍：《本草纲目》，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640 页。

④ 李昊：《食物本草》，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60 页。

⑤ 《汉武帝内传》，载《道藏》，第 5 册第 47 页。

⑥ 尚志钧：《〈海药本草〉的考察》，载《中华医史杂志》1987 年第 1 期。

⑦ 温翠芳：《唐代外来香药研究》，陕西师范大学 2006 年博士学位论文，第 48 页。

⑧ 刘文泰：《本草品汇精要》（上），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57 页。

⑨ 李时珍：《本草纲目》，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962 页。

⑩ 李时珍：《本草纲目》，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940 页。

⑪ 陈嘉谟：《本草蒙筌》，中国医药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187 页。

⑫ 李时珍：《本草纲目》，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855 页。

⑬ 李时珍：《本草纲目》，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944 页。

年五月，累遣使贡牙像及塔，并献沉檀等香数十种。”^①其所谓的“盘盘国”在泰国或马来半岛一带，存续于公元3—7世纪^②。

可见本草书中部分香料药记载所称的产自“昆仑”并非当今普遍意义上的昆仑，而往往指南部热带的诸多地域，甚至有海上“昆仑国”之说。《南夷志》曰：“昆仑国，正北去蛮界西洱河八十一日程。出像，及青木香、旃檀香、紫檀香。”^③“南海昆仑”概念的出现是与西域昆仑作为商路象征相关的。陆上商路早起，很多从中亚、西亚经陆上丝绸之路输入的商品被以“昆仑”称之，从隋唐之后，海上商路兴盛，部分商品转从海上流入，同被冠以“昆仑”之名。又《旧唐书》称“自林邑以南，皆卷发黑身，通号为昆仑”^④，《山海经》中本有“昆仑奴”的称谓，与南亚民族的形象混同，逐渐诞生出了“南海昆仑”的概念。因此，在隋唐之后本草书中的“昆仑”，已经超越了西域商路的含义，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汇通中外的交通枢纽的代名词。

结 语

中国古代本草学与昆仑文化有密切关联。

昆仑神话与蓬莱神话共同推动了汉代的方仙道运动，这一运动对本草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昆仑西王母的信仰具有药物崇拜的特征，其神仙方术的文化特色塑造了中国古代本草学超越性的文化品格：不仅仅是寻求治疗伤病，同时还追求人身体的健康圆满与生命状态的升华飞跃，本草书中常提及的“昆仑”与“西王母”等语具象了昆仑文化的生命哲学特色。同时昆仑高原作为丝绸之路南线的交通节点，不仅在地理上具有重要地位，而且在文化传播上也起到了关键作用，许多异域商品和药物通过这条路线传入中国，丰富了中国的本草学知识。本草书中的地理昆仑出现了“西域昆仑”与“南海昆仑”的含义分化，两者共同表现出“昆仑”作为连通中外的交通枢纽的象征意义。因此，深入发掘昆仑文化与本草文化之关联，是研究中国古代本草学的重要路径。研究昆仑文化对中国古代本草学的影响，对于我们理解中国本土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和独特性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昆仑文化的深入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本草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发掘中国古代医药理论的思想根基与文化生态，从而增强中医药研究的哲学基础与人文共识。

① 姚思廉：《梁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793页。

② 胡守为、杨廷福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 魏晋南北朝史》，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635页。

③ 李昉等：《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4349页。

④ 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270页。